

第一章 无耻求“和平”

蒋介石与汪精卫仍在明争暗斗。蒋介石对高宗武的行动一清二楚，高宗武同汪精卫关系密切，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觉得和谈有望，又怕汪精卫行之太过。在他看来，无论是“和”是“战”都得由他负责，而不许他人染指。如果因高宗武的活动而使汪精卫与日本相勾结，这对他的地位，不能不是一个威胁。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蒋介石的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陈布雷将此情况暗中告诉高宗武。高正在兴头上，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沮丧，急忙向周佛海求计。

汪精卫和周佛海认为中日“和平”有望，不能就此撒手，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指令高宗武去日本，而高宗武已知道蒋介石的打算，不敢造次。汪精卫和周佛海对高宗武软硬兼施，高宗武吓得匆匆忙忙赶到香港。虽然高宗武此行未经蒋介石同意，但陈布雷认为高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仍批准照发其活动经费。

高宗武同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在香港九龙广东酒家订立双方保证今后共同行动的“觉书”。高宗武还讲了自己的设想：日本发表撤兵声明，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由各种“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的“和平运动”变成全国性运动。

松本重治望着戴着黑色眼镜、矮个子、高颧骨的高宗武，希望高宗武一定去东京，以实现他的上述计划。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唆使下，决心以汪精卫为同伙。他认为蒋介石冷酷，而汪精卫

温暖。他决定背着蒋介石，亲自前往东京。

6月22日晚，高宗武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苏科科长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客轮，日人伊藤在那里等候他们一起前往东京。

7月5日，“皇后”号抵达横滨。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高宗武等被接到东京，住在麻布区住友公馆建筑古雅的贵族别墅里。是时，日军陆军省也已改组，由板垣征四郎任陆相，东条英机任次官，影佐担任了参谋部谋略课长兼任陆军省军务局课长。军务局是陆军省内最有权势的一个局，局长中村明人，对影佐十分器重，因而，影佐等于兼任军务局长，深受板垣信任。陆军省的这一布局，使高宗武的赴日，达到了汪精卫集团所意想不到的后果。

高宗武经影佐的引导，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首相近卫、外相田八郎等人。高宗武发现，日本对蒋介石既想要跟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强烈不满，因此表示不能同意与蒋进行谈判，而寄希望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高宗武便要求日本内阁总理近卫写一封亲笔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但近卫认为，一国内阁总理如这样做，未免过分，至少为时尚早。他只允许由陆相板垣写这封信说明此意，由高宗武带回转交。

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了“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所谓“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五相会议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规定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

高宗武由伊藤陪同，从日本长崎乘船回到上海。因咯血，住进杨树浦医院治疗。待身体稍好即于 8 月下旬回到香港。高知道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私自赴日，恐被蒋逮捕，不敢回武汉，便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派周隆庠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

周佛海看到报告立即拿着报告去同汪精卫商量。周道：“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为妙。”

汪精卫看到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虽然感到吃惊，但心里是高兴的。不过汪精卫此时还未下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的决心，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并想借日本人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便对周佛海说：“这是没关系的，将报告原样交给蒋。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方无疑是要他下台，十分恼火。将高宗武的报告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已经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

过了 3 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怒气满面，大发雷霆，骂道：“高宗武是个混蛋，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的？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其活动经费立即停发。”

周佛海和汪精卫已经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决心继续干下去。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 3000 元供高宗武使用。并要高暂时再观形势，无论如何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

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

判。是时梅思平奉“艺文研究会”之命在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但他对这项差事并不感兴趣，颇感寂寞，静极而思动，因此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周佛海、高宗武交给他的与日方直接谈判的任务。

梅思平从此也就成了汪精卫集团“和平运动”的一员干将。梅思平后来公开投敌，他的一个正在温州女中读书的女儿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气愤，当即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文章，说：“梅思平不是我的父亲，我要捉拿他，杀掉他，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篇文章，一时全国报纸杂志相争刊载，传布极为普遍。

梅思平于1938年8月29日同松本重治在香港岛酒家举行第一次谈判，由日语好得惊人的周隆庠作翻译。谈判一开始，松本为了要判断一下梅思平究竟是个什么样人物，故意谈笑风生，显得十分轻松，使梅毫无拘束之感，便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

松本在谈判时说：“和平运动成功与否，在于撤兵，日方认为蒋介石下野，日本才能撤兵。”

梅思平道：“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笨拙的做法。蒋介石掌握了国民政府的主要权力，成了中国战场上的最高统帅。如果日方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撤兵的条件，这样既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还会适得其反，使汪精卫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使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收拾时局。”

松本表示下次再从从容谈。为了不被人跟踪，梅思平提议以后每次谈判都要改变地点。

梅思平在继续谈判中，对撤兵和蒋介石下野问题，说道：“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方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即使说日方声明撤兵，并已部分撤兵，然

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绝对反对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 没有止境。国共在内战中胜败如何 这是次要问题 首要问题是在保护民生。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都有同样见解。根本问题是人道问题。松本，你精通中国的事，对此不会不知道吧。”

汪精卫汉奸集团 标榜他们‘倡导和平’的目的 是为了“考虑中国的民生”；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作为借口，乞求日本在不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条件实行撤兵，这是他们打出的两块招牌。

松本立刻表示：“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

梅思平又称：“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

从 8 月 29 日至 9 月 5 日间 梅思平同松本进行了 5 次谈判 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

10 月 21 日 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 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接洽情况。梅思平同周佛海、陶希圣 3 人商谈后 往见汪精卫。尔后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11 月 2 日 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离开重庆 经河内返回香港。同高宗武会面后 为避人耳目，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道尔曼号”和意大利轮“戈善特亚号”去上海 同日方继续谈判。

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的一

幢孤零零西式的灰色二层楼房内。房子已经陈旧 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东体育会路 7 号”。今井武夫事前派人将房间进行了整修 并作了精心布置 并改名为“重光堂”。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庠先后被接到重光堂 与今井武夫 伊藤举行预备会议 几天来，重光堂内鬼影幢幢，日汪双方的一笔肮脏政治交易在这里成交。

在谈判中 高、梅承认日方所提出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地区允许日军驻扎 承认伪满洲国 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之自由 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并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高、梅两人也提出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 并在期满后即撤退 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 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 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华租界。

这些所谓“要求”、“希望”仅仅是一纸空文 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卖国条件时制造的一块遮羞布。然而 日方代表还嫌价码太高 不肯同意 双方争论了 6 个小时 才达成初步协议，将上述汪方的意见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高宗武、梅思平还提出重建“中国政府”“汪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不得同新中央政府处于同等资格的地位，否则，新中央政府就难以建立。他们声称 作为“中国新政府”不考虑与被人民认为是傀儡的南北两政权合作或合并，热切希望日方考虑取消这两个组织。对于这两个政权中“善良者”不妨包容为“新政府”中的地方官吏。

今井武夫予以驳斥 声称：“临时”、“维新”两政府均系日本指导下的政府，在有关日本帝国范围内，均为友好之地方政权，从而期望其存在及发展 此乃我帝国之信义。因此 不能考虑约

定将其取消。

双方争论不下，今井武夫认为既然不可能“一争到底”，可待以后由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协商，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临时”、“维新”政府发表声明，明白表示它们为“救国”而一时出马，现汪政权既已成立，则可自行解散。于是，这一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精卫提出所谓“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及其有关政策。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表示同意。

会谈后，今井武夫急匆匆地离开上海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首脑会议作了报告。会议决定以重光堂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尔后，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一起到达上海，同高宗武、梅思平等在重光堂进行正式会谈。高宗武、梅思平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草拟了近卫、汪精卫声明要点，制定了汪的叛逃计划。《协议》规定：

(1) 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

(2) 中国承认“满洲国”。

(3) 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华租界。

(4) 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5) 赔偿日侨损失。

(6) 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重光堂秘约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份卖身契。然而，贪得无厌的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 只是设下一个圈套 把在重庆的汪精卫等人勾引出来。重光堂密约并没有把日寇的欲望全部端出来，免得超过汪精卫集团所肯承受的程度，致使其分裂中国抗日阵营的阴谋落空。10 天以后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对中国提出更广泛、更苛刻的要求。

重光堂会谈一结束，日汪双方的活动更加紧张起来。

影佐祯昭、今井武夫飞回东京 向陆相板垣、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中将等提交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尔后板垣带着影佐、今井去首相官邸 向五相会议提出报告 并商定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今井返回上海，等候汪精卫集团的答复。

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堂会谈之后 即返回香港。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 从香港飞往重庆 向汪精卫汇报。“密约”藏在上清寺汪公馆里 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心怀鬼胎 怕不保险 即把它放在一只小皮箱内 亲自上锁 由她内侄陈春圃陪同 送往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她胞妹陈淑君处。陈璧君还不放心 于次日将小皮箱取回索性拿出“密约”烧掉 省得提心吊胆。

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梅思平等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 讨论是否接受“密约”问题 急于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接受。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性 她自 1926 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以后 政治欲望逐渐膨胀。她随汪精卫沉浮于政海 为汪出谋划策。她生性尖刻、高傲自大、目空一切。她不仅依靠汪爬上中国政坛顶峰，且左右汪精卫。有人背后议论说 汪精卫没有陈璧君 办不成大事 没有陈璧君 亦不致于败事。“惧内”成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

汪精卫在历史上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尖锐的斗争。汪虽

然仍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但仍在蒋介石之下，且未能掌握实权，因此很不满。

周佛海也是一个权力迷。他在敌机轰炸武汉时，未经蒋介石许可擅自离职躲到重庆，蒋知道后震怒。周佛海并不以代理宣传部长为满足，极想得到财政部长位置，而财政部长始终都由蒋的妻舅宋子文或蒋的联襟孔祥熙充任，不准他人染指。周在日记中抱怨说：“蒋从未以‘国土’对待他。”

汪精卫集团和蒋氏之间在战和问题上又发生分歧。一次汪精卫对蒋说：“如不能战，则不如和。”

蒋介石则说：“抗战易，和平难。”

汪反驳道：“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

虽然汪精卫投敌心切，但总是惶恐不安。他惧怕全国人民反对他，也顾虑同日本人的交道不好打。周佛海、陶希圣劝驾说：“你兼外交部长时，和日本打过交道，还算是顺手的。”

汪回道：“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藏本在南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那时我兼外长首当其冲。类似的事，不遑枚举。直今我还心有余悸。”

汪精卫犹豫不决，每天晚饭后总是在寓所的院子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陷入穷思的苦海中。他在一次会上忽然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方须商量”。

周佛海、梅思平则以冷淡处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原来，周佛海对汪精卫深切了解，认为汪为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10余年屡遭失败。但汪仍想实现其领袖欲，虽有反复，必仍按原计划也，便采用以退为进策略。果不出周佛海所料，次日，周佛海、梅思平再赴汪宅，汪开始提出难题甚多。周佛海即提议：

“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

汪闻此言，担心果真作罢，便改变态度，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决定照此答复。”

汪精卫在家设筵为梅饯行。宴后汪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作了答复。日方也通知汪精卫集团，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根据计划，汪精卫将于 12 月 10 日左右到达香港。高宗武通知西义显说：“我已准备接汪先生来香港。但必须设想突发情况，需要日总领事馆保护，而现任总领事我们不熟悉，若能以我们熟悉的田尻爱义君代之最好。”

日本政府立即回答，表示可以满足，急电影佐转告外务省，将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调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于 12 月 10 日抵达香港。

汪精卫选择逃离重庆的路线，一是由重庆直飞香港，二是经昆明赴河内。由于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这样做有很大的冒险性。因而选择了经昆明赴河内这条路线。因昆明是龙云的地盘，他便事先征求龙云的同意。

龙云自 1928 年起任云南省主席，成为拥有地盘的地方实力派。龙云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对国民党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抗战爆发后，龙云拥护抗战，云南军队被编为第六军，由卢汉任军长，开赴前线参加抗战。但龙云对蒋介石利用抗战蓄意牺牲非嫡系部队不满。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往西南后，蒋介石积极向云南渗透，龙云深恐他的地盘被吃掉，同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汪精卫乘机拉拢龙云。

陈璧君 3 次去广州、两次去湖南、广西活动 窥探虚实 同广东军政要人余汉谋、吴铁城等人晤面，进行拉拢，回渝途中在昆明停留 与龙云“促膝长谈”。龙云道：“云南因不合理之负担而消耗殆尽，而武器弹药，及装备分配与中央军部队相比较，则天渊之别。”

陈璧君鼓动龙云反蒋，答应帮助龙云解决军队急需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她提出在南洋筹集华侨资金，帮助龙云开发锡矿，以资拉拢。龙云虽与汪精卫素无交往，只见过汪一面，但一向对汪十分推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想结纳汪，利用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与影响，作为他的政治依托。经陈璧君串通，龙对汪更有好感。陈璧君见火候已到，便哭丧着脸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 很想换换环境。

龙云为之动容 道：“汪先生如果来昆明 我很欢迎 如果愿意由此出国 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第二章 卖国‘艳电’

陈璧君回重庆后，对龙云赞不绝口。汪精卫便决定经昆明出走，为避人耳目，决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汪精卫托词去昆明讲演，离开重庆。陈公博自成都飞往昆明。陈璧君的远房侄辈陈春圃打前站先走。

陈春圃时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兼侨民教育处长，在政治上同汪精卫如同一辙。加上他办事认真细致，深为汪夫妇器重。汪精卫以送子女到香港读书为名，要陈春圃把他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恂护送到昆明。并要陈预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

汪的行动十分诡秘。将侍卫队长刘文焕支走，将雇佣的女佣遣散。他们清理东西，有的书籍文件装进印有“双照楼”³字的箱子里。除汪等少数几个人之外，连在重庆的陈璧君的胞妹、汪精卫的侄子都不知道。许多汪派骨干也没有通知。陈璧君问汪：“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介石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

汪精卫道：“蒋介石是个奸雄，我们走后，他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被严防，不会被害，我们现又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

汪精卫希望陈公博随他出走。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1938年春又担任国民党四川省部主任委员，长住成都。

11月底，汪精卫给他发去电报，要他立刻到重庆来。陈急忙返渝

见汪精卫。汪告诉他：“中日和平已成熟，我就要离开重庆，希望你随我出走。”

陈公博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原来，汪日间的秘密勾结，陈事先一无所闻，且陈在“和”与“战”问题上同汪有一定分歧。陈根据他过去几年对日交涉的经验，认为日本绝无诚意，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要他一道出走，持反对意见。这便触怒了陈璧君，她挖苦陈公博说：“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你一个人留在此地当蒋介石的官好了。”

陈璧君深知，陈公博同汪精卫的关系实在太深了，他们走后，陈就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她说这话不过是使激将法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陈公博一回成都，反复考虑走还是不走，思想斗争极为激烈，夜不能合眼。他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定出走为上。

于是，汪精卫集团便开始行动。周佛海照计而行，12月5日飞往昆明。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搭机前往昆明。

日本政府向新闻记者透露：首相近卫文麿将于12月11日晚在大板大礼堂发表演讲，宣布对华“新政策”。

不料，事情发生了波折，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蒋介石突然从桂林返回重庆。汪精卫一时无法脱身，不仅打乱了他叛逃的计划，而且他担心以前的行动是否已经暴露，汪的眼前老晃动韩复榘的影子。前不久，韩复榘不战而退，被蒋处决。汪深知蒋的手腕，若知道了自己出逃的底细，下场将不堪设想，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掩人耳目，汪精卫便频频在公开场合活动，接见记者，出席讲演会，分别接见孔祥熙、戴笠、陈布雷等蒋氏亲信，听取他们的“汇报”。但他掩盖不住其内心的虚弱，时而流露出不自然之神态。

已到达昆明的周佛海从陈春圃那里得知：“蒋先生今日到重庆 汪先生嘱一切慎重。”他惊慌起来 如坐针毡 举棋不定 坐立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多周折 往往如此 成败真由天定 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 苦心焦思 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 其返渝暂观形势欤 若思深想 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 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 早则多挨几天骂 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 在在可寻，一旦发现 国未得救 而身先丧矣！”

周佛海通知龙云 汪先生暂缓行期。此一变化 也关系到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的问题。周佛海电告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 要他们通知日本方面 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

近卫于 12月 11 日在大坂发表演说的消息已公布，得知汪未能如期脱离重庆，只得发表一个假消息，伪称近卫因患肠病，中止大坂之行。

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 也感到十分焦急 不得不取消了汪精卫代定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等待着重庆的消息。

蒋介石与陈布雷本在桂林行营 此次返回重庆 并非获悉汪精卫等人与日本有秘密勾结和叛逃的缘故。

在重庆的汪精卫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左盼右盼 才找到了一个脱逃的机会。18 日 蒋介石发表训话 汪可以不参加。趁此机会，汪精卫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购买几张飞机票。彭原汪系人物，自然奉命照办。

这天上午 9 时 陈璧君和汪的亲信曾仲鸣、女婿何文杰等 4 人，预先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她和汪约定，汪在启飞前数分钟内赶到。陈璧君到机场时，刚巧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要搭机飞滇。陈璧君做贼心虚，连忙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 仅含糊其词地说是“汪夫人”有事赴滇。离开起飞的时间

将到 汪精卫仍然未来 陈璧君心里十分着急 嘱咐曾仲鸣 如汪精卫迟到 就向机场说明有汪搭乘 令飞机延缓起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正沿着珊瑚坝疾驰而来，汪精卫由一名侍卫陪同赶到。周至柔等看到汪精卫，都上前谒见。陈璧君这时才告诉周，说汪精卫去昆明讲演。

飞机起飞后不久 周至柔想乘这个机会 在汪副总裁面前显露一下自己的飞行技巧。他进驾驶室 亲自操作。这下把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吓得虚汗直冒。他们以为周至柔是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令他驾机返航。陈璧君偷偷地问曾仲鸣怎么办？曾仲鸣暗中告诉汪的侍卫，要他作好一切准备。正当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忐忑不安之际，周至柔过足了驾驶瘾，从驾驶室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汪精卫这才松了一口气。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后 汪精卫走出机舱 龙云率领省政府各部门官员列队相迎，顿时军乐大作。汪精卫见此，生气地责问陈春圃 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 汪精卫事先电告陈，要他以“保密及防备日机中途拦击”为名 只许龙云 1 人来接 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 2 人。陈照此通知了龙云。龙虽口头答应 但一转身却告知了各厅、署、局长，不多时 各条街道的商店也零零落地挂起了“国旗”奉命表示欢迎。陈春圃看到后十分着急，去见龙云 请他下令收旗 并不要张扬 但已来不及了。

汪精卫历来爱出风头 这次一反常态 到了晚上 他才向陈春圃道出秘密：“我虽然是托词演讲而来 实际上是借路溜走 因此接见的人越多越难对付。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

汪精卫要曾仲鸣出面 说汪精卫在飞机上因颠簸太甚 脉搏有间歇 当地官员一律改日延见。

由于蒋尚在重庆 汪感到此行极其危险 能否离开 惟在龙

云态度如何，忙问周佛海与龙云接触的情况。周佛海认为龙不致为难。汪于当晚与龙云交谈，将自己组织政府的计划向龙云作了详细介绍，果然得到龙云的赞同，并保证响应汪的声明，负责汪安全出境。汪精卫见目的已达，长舒了一口气。

陈璧君却想得周到 万一明天天气不好不能起飞 而被迫改乘火车的话，到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会狼狈的，因此指派陈春圃明晨一早乘车先走，以备万一。汪精卫知道后，笑逐颜开地表示赞同 并关照说：“不管坐的是什么 总之明天非走不可 呆下去要出事的。”

12月19日 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汪文愷、何文杰及副官、随从等一千人等 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汪精卫为掩盖自己投敌真相，在离开昆明前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飞行过高，身体不舒服，且脉搏搏时有间歇现象 决定多留几日 再行返渝。次日 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

汪精卫集团对云南龙云、广东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寄以很大希望，千方百计拉拢。他们的计划是引诱他们一道下水。汪精卫公开打出“和平”的旗号时 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张发奎起而响应，接着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这样既可釜底抽薪，削弱抗日阵营力量，挖蒋介石墙脚 又可增强自己的势力 拼凑一支武装力量 陈璧君、汪精卫都同龙云深谈过，龙表示拥护。

然而 汪精卫等人一走 龙云立即致电蒋介石 报告了汪等一行于“午后2时已离滇飞航河内”。待陈公博离开昆明后 龙云再次致电蒋：“汪到滇之日 身感不适 未及深探 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 不无诧异。匆匆离滇时 始道出真语 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 若能成功 国家之福 万一不成 则暂

不返渝 亦不作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 早有此种心理 惟关系甚大，未知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

龙云既想依靠汪精卫 通过中日间‘和平’以保存其地盘和实力；又考虑到投汪成败难卜，弄不好就会受千夫唾骂，而且还会遭到蒋介石大军压境，丢失一切。

龙云的动向，引起蒋介石集团的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前线屡遭失败，蒙受重大损失，若云南、四川等地脱离抗日阵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云南是后方的一个大省，又是重庆通往国外的主要门户，滇缅公路是当时国外物资供应的交通线，昆明机场成为飞航重庆、香港和印度间最忙碌的中国机场。云南的向背，关系到整个抗战全局，也直接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蒋认为，非得要做好龙云的争取工作不可。

李根源根据蒋的请求，首先跑到云南。李是国民党元老，是云南军政界老前辈，在云南颇有威信。李又是龙云的老师，龙云对他十分敬重。李劝龙云道：“若你发出通电 中央的飞机就轰炸你 你首先被解决无疑。”

龙云问：“依老前辈的意思 应如何办呢？”

李根源道：“你这个通电不发就行了。你没有行动 中央也不会追究 你就无事了。”

唐生智也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昆明。唐曾是汪精卫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把自己在 1927 年和 1929 年跟汪精卫吃亏上当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龙云 要龙云警惕 他说：

“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并告诫龙云：“民族大义，千古是非 在抗战其间，忠奸不两立。”

唐生智、李根源等人的劝告，使龙云面对现实，最终未按汪